

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 历史溯源、传统价值与跨文化叙事

毕健康 刘欣路 肖凌 黄蕙

摘 要：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对话与交流绵延千年，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进、中东地缘格局加速调整，阿拉伯国家的秩序观、安全观、发展观等观念发生明显变化，中阿之间的共同性、共通性因素明显增加。中国的国际传播理应抓住阿拉伯受众日益“向东看”的趋势，积极回应其信息需求。但由于中阿历史上深层次文化交流的有限性和当代中阿文化的差异性，对阿国际传播中还存在“文化折扣”现象。本文学者分别从历史溯源、文化传承、新闻传播和跨文化叙事构建等角度分析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特点、挑战与展望，以期提升国际社会对文明多样性价值的认知。研究表明，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与理念在促进文明间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的同时，为全球南方的整体叙事重构提供了新范式。

关 键 词：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文明多样性；全球南方

作者简介：毕健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2488）；刘欣路，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北京 100089）；肖凌，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教授（北京 100024）；黄蕙，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人文交流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客座研究员（北京 100037）。

文章编号：1673-5161(2025)04-0003-27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杜环西行与中阿文明互鉴

毕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自古以来友好交往、交流互鉴,谱写了辉煌篇章。根据考古资料,中国与阿拉伯的间接贸易往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1 世纪的西周时期。在埃及,考古学者发现了中国西周时期的桑蚕丝制品,那时只有中国养蚕织丝。最晚到公元前后,也就是西汉和东汉之交,就有埃及的魔术师来到中国。到汉代时,埃及的玻璃制品也辗转输送到中国。中国的唐代与阿拉伯帝国如同人类文明两盏明灯,矗立在亚非大陆东部和西部。两大文明的交流交往,将中阿文明互鉴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杜环成为有据可考的第一个抵达阿拉伯核心地区和第一个游历非洲的中国人。

(一) 杜环西行,抵达摩洛哥

751 年,唐朝镇西节度使高仙芝与阿拔斯王朝军队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激战兵败,至少 1 万唐军被俘,其中有不少中国工匠。中阿历史上这场著名的怛罗斯之战,成为杜环西行,游历西亚北非,促进双方相互了解,深化文明互鉴的契机。

杜环,生卒年不详,唐代旅行家,《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通典》云:“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地中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①根据《经行记》的文字水平和记载内容,并与阿拉伯史籍相互佐证,基本可以判断:杜环文化素养高,知晓军事,在军旅中应担任比较重要的军职;他在怛罗斯之战中被俘,作为阿拔斯王朝呼罗珊大军的一部分,在中亚驻留时间较长;后来在伊本·艾什阿斯麾下,作为阿巴斯王朝平叛大军一员,于 761 年抵达摩洛哥。据宋岷先生考订,在阿拔斯王朝对摩洛哥的戡乱中,杜环应立下功劳,于是得以恢复自由之身,762 年返回中国。^②

751 年,杜环开始他漫长的西行之旅。他在中亚地区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根据考证,他在木鹿(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雷),滞留了大约 6 年时间。从中亚沿着呼罗珊大道,向西南方向行进,大约 757~758 年到达阿巴斯王朝正在兴建的新首都

① 许永彰:《我国最早的一部西亚非洲游记——〈经行记〉》,载《西亚非洲》1983 年第 2 期,第 41 页。

② 宋岷:《杜环游历大食国之路线考》,“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广西东兴,1997 年 11 月。

巴格达。据研究,杜环可能到过巴格达建筑现场。杜环从巴格达出发,沿着幼发拉底河逆流而上,到达今叙利亚(苦国)。在阿拔斯王朝腹地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停留大约两年后,从大马士革折而向南,来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地耶路撒冷,在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听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的训话。之后,杜环继续南下,穿越苏伊士地峡和西奈半岛,约759年进入埃及,踏上了非洲的土地。他抵达埃及首府福斯塔特,尔后经过亚历山大,继续西行,直到摩洛哥(摩邻,马格里布, Maghrib)。^①杜环游历到摩洛哥,抵达阿拉伯世界的最西端,遥望波涛汹涌的大西洋,而后他折而东返,在今埃及苏伊士运河南端的苏伊士附近,搭乘商船抵达伽儿(Jar,阿拉伯半岛西部的红海港口城市,离麦地那一天一夜的路程)。在伽儿他搭乘直航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商船,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762年,杜环从广州上岸,回到中国。

(二) 新都巴格达的兴建与《经行记》的史学价值

旧都库法什叶派势力强大,骚乱频仍,阿拔斯王朝真正奠基者、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决心迁都。曼苏尔曾骑行踏勘过好几个地方,最后决定在巴格达兴建新都。“巴格达”本义“天赐”,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军事上易守难攻。曼苏尔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优良的营地。此外,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可以把各种海产和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及其四周的粮食,运来给我们。这里有幼法拉底河,可以把叙利亚、赖盖及其四周的物产,运来给我们。”^②

可见,曼苏尔亲自勘察和确定新首都的选址,巴格达优越的经济枢纽地位是其首要考虑。他非常关心百姓的民生:“我希望的(新首都),是一个能让百姓获益的地方,是个让他们和我都感到舒适的地方。在那里,对他们而言,其物价不能高,粮食供应不能发生困难。再有,我居住的地方,来自陆路和海洋的物品的价格也不能高,物资不能少。(粮食)供应不能匮乏,不能让百姓感到困难。”^③

对于曼苏尔亲自勘察,决定在巴格达建造新首都,可以进行如下解读。首先,在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前,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海上丝路贸易已经畅通,因此他才会说通过底格里斯河,巴格达“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建都巴格达,就是要把巴格达建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使之成为连接中国

① 对于杜环抵达、游历和记载的“摩邻”地点,学界考订得出多种结论:东非马林迪,曼迪,麦罗埃,摩洛哥(马格里布)和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艾周昌、许永彰和宋岷三位先生均主张摩洛哥说。

②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40页。

③ 宋岷:《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唐)杜环〈经行记〉新证之一》,载《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76-77页。

和非洲、欧洲(罗马帝国)的国际贸易的大都会。他的目的是发展与中国的直航,变间接贸易为直接贸易,免除中间盘剥,大幅度地降低运费和商品成本,变小批量贸易为大宗交易。如此,则进口商品价格降下来,繁荣市场,百姓受益,并坐享转口贸易关税。其次,阿拉伯军队在怛罗斯战役中获得大批前所未见的嵌金的瓷器和丝绸,这些珍贵物品一度落到了大食东道使艾卜·穆斯林手中,最终辗转进贡给阿拔斯朝廷。这个事件,当然是阿拔斯王朝封疆大吏艾卜·穆斯林心生叛意的结果,但是也表明遥远而漫长的陆上丝绸之路风险重重,容易遭到截断。因此,曼苏尔决心以新建巴格达为契机,畅通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往来。

758 年,阿拔斯王朝开始建筑新都巴格达。762 年,这座新首都初具规模,内外两道城墙已经建成。763 年曼苏尔正式迁居新都巴格达,766 年巴格达完全竣工。据史书记载,为了修建巴格达,曼苏尔从帝国各地抽调的 10 万建筑师和工人,国库花费了 488.3 万第尔汗(银币)。曼苏尔把新首都定名为和平城,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这里曾建筑过古代世界的几座最强大的都城。曼苏尔兴建的都城,用砖砌成,呈圆形,故有“团城”之称。^①城分外城、内城和紫禁城三层,恢弘雄伟。当杜环随军抵达巴格达时,巴格达的建设正如火如荼。

杜环在《经行记》“亚俱罗”一节,生动描绘了鼎盛时期阿拉伯市场的热闹繁华与风土人情。“郭郭之内,里闹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秀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琉璃器皿,瑜石瓶钵,盖不可数算。梗米白面不异中华。”^②这段话的大意是:城墙之内,闹巷之中,只要是土地上生长的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应有尽有。市场上人挤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货物,品种丰富,价格低廉。各种绸缎,珍奇珠宝,贵重商品,市场上多得很。各种牲口,骆驼、马和骡子,到处都是。各种造型的漂亮的玻璃制品,这些东西,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大米和白面,与中国的差不多。

据研究,杜环《经行记》的这个生动描述,应该就是正在兴建之中的巴格达的繁华市场。“由于最大的工地需要各种补给,因此,巴格达自然会成为最大的市场。可见,为了劳动大军的衣食住行,为了巴格达城的建设,各色中国工匠、各色中国商货也自然聚集巴格达,而不是聚集在其他无关紧要的地方。因此,《经行记》中的中国工匠是巴格达的建设者。”^③而且,拥有诸色中国工匠、当时驻扎在巴

① 郭应德:《阿拉伯史纲:610-1945 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5 页。

② 宋岷:《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唐)杜环〈经行记〉新证之一》,载《海交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第 79 页。

③ 同上,第 79 页。

格达的呼罗珊大军,也应征参加巴格达城的建设。杜环根据在巴格达亲眼所见,在《经行记》中记载了中国工匠:“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①可见,在阿拔斯王朝腹地亚俱罗(Athur,亚述,即巴格达)的市场上已经有中国商货,还有纺织绫和绢的织机,以及有姓有名的中国工匠,突显了《经行记》的史学价值。

杜环在摩洛哥的时间并不长,但观察万物,体察民情,记载摩洛哥民风民俗:“又去摩邻国,在秧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鹊莽。鹊莽即波斯枣也。瘴厉特甚。”

这段话大意是:后来又去摩洛哥。摩洛哥位于耶路撒冷西南方向,秧萨罗就是耶路撒冷。穿越西奈半岛的大沙漠,往西走 2,000 里,就到了摩洛哥。摩洛哥人皮肤黑,性情粗犷豪放。不出产大米和小麦。用鱼干喂马,说明盛产鱼类。人们喜欢吃椰枣。疟疾流行得很。

(三) 唐代迎来中阿文明互鉴的第一个高峰

杜环西行,在从中亚到摩洛哥的疆域广袤的阿拉伯世界,游历了 10 余年。这个看似偶然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阿文明交流史上的佳话,是千余年来双方友好往来,交流互鉴的高潮。中阿双方的往来,经历了从间接贸易到直接贸易,从人员往来到商品交换,从生产技术的互学互鉴到水果农作物的相互引进的发展过程,到唐代中阿文明互鉴迎来第一个高峰。

首先,罗马帝国和阿拉伯遣使访华。一是公元 166 年安敦遣使访华,得到东汉皇帝的接见。根据中国史籍《后汉书》记载,公元 166 年罗马帝国皇帝安东尼·奥古斯都(161~180 年在位)遣使访问:“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②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商人假借罗马皇帝的名义来华,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这位使者很可能受亚历山大总督的指令,到中国进行商业活动,开辟直达中国的新航路。东汉皇帝接见了这位使者,双方实现了正式的直接交往,意义重大:“他们是有记载的进入中国都城的第一批西方人,这标志着罗马(包括埃及)同中国建立了直接的外交和经贸关系,也标志着横贯东西的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形成。”^③二是公元 226 年秦论使华,在武昌受到孙权的接见。“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入。’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

① 宋岷:《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唐)杜环〈经行记〉新证之一》,第 78-79 页。

②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 页。

③ 同上。

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①秦论在华至少 8 年,临走时孙权赠送他 20 名矮人。三是 281 年和 284 年,西晋时期大秦使者访华。西晋武帝泰康二年,“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指广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② 284 年(西晋太康五年)12 月,“林邑、大秦国多遣使来献”,其中有蜜香纸 3 万幅。蜜香纸产于广东和越南北部,用蜜香树皮纸浆制造。大秦使者可能在到达中国沿海后,购买名贵的蜜香纸,作为献礼送到洛阳。可见,从东汉到西晋,阿拉伯使者零星使华。然而,到了唐代,阿拉伯使者访华平均 4 年一次。根据中国史籍记载,651~798 年间进入长安,与唐朝通好的大食使节共 39 次之多。^③ 杜环西行 10 余年,留下《经行记》,彰显唐代中阿双向交流远远超越两汉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其次,中阿之间开辟海上直通航路。395 年罗马帝国分裂衰弱,埃及船舶停止向东远航,中国史籍上再也见不到大秦商人奉献的记载。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分裂期,但是航海事业仍在发展。比兹莱认为,中国船只在 3 世纪时已经出现在波斯湾一带。《梁书》曰:“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380 年,希腊史学家阿米亚·马赛林(Ammianus Marce Uninus)在《历史》中写道:“公元 360 年左右,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巴达尼亚(Batanea)一年一度的集市上,便陈列有中国的商品。”^④有学者认为,这些商品有些可能是中国船运来的。成书于 5 世纪末期的《宋书》记载,中国与大秦、天竺之间“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中国船只 5 世纪左右已经航行到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附近,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公元 6 世纪,中国船只经常访问波斯湾,并直航阿曼、巴林、俄波拉和巴士拉港。^⑤ 到唐朝时,中国航海事业大发展。根据《旧唐书·贾耽传》和《新唐书·地理志》,贾耽写作的“广州通海夷道”分为两个部分,前半段记载了从广州经过南印度到波斯湾的航程,后半段记叙了从波斯湾到东非沿岸的航程。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唐朝时中国船只已经超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直航非洲,最远到达东非海岸。^⑥

再次,传播到中国的若干阿拉伯商品及其生产技术和动植物,如琉璃、玻璃、制糖业、葡萄、西瓜、椰枣、棉花等,生动彰显了文明互鉴的意义。埃及人公元前 3000 年开始制造琉璃器皿,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琉璃制品的民族。到汉武帝时,埃

① 许永璋:《古代中非关系史稿》,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9 页。

②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第 18-19 页。

③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 3000 年交往史》,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39 页。

④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第 21 页。

⑤ 同上;许永璋:《古代中非关系史稿》,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6-47 页。

⑥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第 30 页。

及的琉璃制品输入中国。《魏略》记载:“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公元5世纪,埃及制造琉璃的方法传入中国;公元前1600年,埃及人以石灰石为主要原料,加工出硅酸盐玻璃和各种器皿、饰珠。约公元前2世纪,埃及玻璃制品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在洛阳发现了公元前2世纪亚历山大制造的玻璃珠,还有一个刻有雅典女神头像的玻璃瓶。后来,玻璃制造方法也传入中国;中国制糖业也曾借鉴过埃及的技术。《三国志·吴志》记载,中国南方交州在3世纪初已经开始生产甘蔗糖,实际上是浓缩糖浆。元朝初年,一些开罗的工匠来华,传授了新的制糖技术,《马可·波罗游记》有详细记载。之后,伊本·白图泰证实,改进后的中国蔗糖的质量“较之埃及蔗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本来有原生葡萄,“汉书作蒲桃”,但是没有推广流传下来。公元前3000年,埃及就人工种植葡萄,并用葡萄酿酒。前2世纪,张骞在大宛见到葡萄和葡萄酒。埃及的葡萄和葡萄酒酿造工艺,经过伊朗在汉代传入中国;西瓜原生赤道非洲,公元前已经传至埃及。最晚唐朝时期,公元8世纪,西瓜经中亚传到中国;椰枣原生于非洲,《经行记》有介绍。椰枣逐渐东传,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8世纪时传入中国,并在包括两广在内的中国南方生长;中国原产亚洲棉,但是产量低。公元前6~5世纪,埃及开始种植草棉,后经中亚传入新疆。草棉至迟在东汉传入中国新疆,到公元5~6世纪棉花种植普及,棉布产量可观。

最后,中国的丝绸、瓷器及其生产技术传入阿拉伯国家,极大丰富了阿拉伯人民的物质生活。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缫丝的国家,距今4,7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绢片、丝带和丝线。降至商代,养蚕、织丝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生产活动。公元前1000年左右,埃及开始使用中国丝绸,大抵是经帕米尔高原、中亚、两河流域,辗转输送到埃及的。公元前1世纪,中国丝绸服装成为埃及上流社会的时尚。埃及还是中国丝绸输入希腊、罗马的中转站,4世纪“罗马人不分贵贱都穿戴丝绸”。埃及还对中国原丝进行加工,建立自己的丝织业,在埃及卡乌发现了公元4世纪用中国丝制成的丝织品。亚历山大是重要的丝织业中心。中国的丝织技术对埃及产生直接影响,公元前8世纪中国织锦就使用有提花设备的平放织锦机。约3~7世纪,提花机传入埃及,促进埃及丝织业发展。^①此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瓷器的国家,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造型而闻名天下。瓷器是海上丝绸之路运输量大且贵重的中国商品。在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片,包括从8、9世纪到清朝的瓷器,被称为“中国古瓷地下博物馆”。中国瓷器的输入,影响埃及制陶业。9~10世纪以来,埃及开

^①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第89-90页;沈福伟:《中国与非洲3000年交往史》,第135页。

始仿制中国瓷器,并反过来促进中国陶瓷业发展。正所谓交流互鉴,相得益彰。

中国的四大发明及其对世界贡献,人所共知。在与阿拉伯世界漫长的历史交往中,中国始终平等相待,虚心学习。平等的双向文明互鉴,书写了各自历史的华章,丰富了中阿双方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包容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文明互鉴是发展的阳光大道。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从杜环或许“偶然”的西行之旅,从公元前 1000 年中阿间接贸易往来到唐代中阿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的文明交往中,汲取历史的智慧,点亮明日之灯。

共同价值建构视角下中国对阿国际传播的 范式转移与路径优化

刘欣路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

阿拉伯世界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重要和天然的合作伙伴。近年来,中阿各领域友好合作发展迅猛,阿拉伯世界“向东看”趋势明显,且内涵发生显著变化,这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创造条件,也为中阿双方从共同价值的高度加强文明互鉴夯实基础。新形势下,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传播应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范式,深刻理解国际传播的政治属性,运用好融媒体大众传播的思维和规律,通过有效的话语转换降低传播折扣现象,将中阿共同价值中蕴含的软实力资源切实转化为软实力优势。

(一) 从利益认同到价值认同:新时代中阿关系内涵的逻辑演进

国家间高水平的文明互鉴不是表层的相互尊重、求同存异,而是基于对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认知,在涉及自身、地区、世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广泛共鸣和共识,进而强化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性遭遇更加严峻挑战,时与势的加速调整促使阿拉伯世界对自身所处的文明危机进行深刻反思。所谓文明危机,是阿拉伯世界长期积累的复杂矛盾的集中爆发,政治分裂、经济衰败、教派敌对、安全恶化、文化边缘、科技落后,“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阿拉伯世界遭遇的整体性危机——脱离于世界和落后于

时代的诸多表征”^①。以约旦学者萨米尔为代表的阿拉伯学者的思想表明,尽管阿拉伯世界仍然战乱频仍、危机四伏,但危机中育新机,在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即秩序与道路这两个核心问题上,阿拉伯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出现的变化正为破解百年中东之间积聚积极要素。

当前的阿拉伯世界,正重新试图重塑内生与外力、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这几组重大关系。在秩序问题上,阿拉伯思想界普遍认为需要以秩序观的调整引领秩序的优化。以往的阿拉伯世界一方面在强大的外力下被动接受域外大国施加的国际和地区秩序,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一个令人困惑而苦涩,难以求解,同时极具怪异性、讽刺性和悲剧性的问题是:在阿拉伯土地上发生的战争,耗费了阿拉伯的钱财,打着解放阿拉伯人的幌子,却几乎完全看不到属于阿拉伯人的秩序!”^②;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在批评西方国家以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殖民思维处理国际关系的同时,自身也染上了严重的战争思维与零和思维。每每在地缘政治出现裂痕时,阿拉伯国家也往往挥起“大棒”,企图以彻底击溃敌手的方式来实现绝对安全,仅从中东剧变以来爆发的叙利亚危机、卡塔尔断交危机、也门危机、沙伊博弈等中就能够看出这种秩序观的支配作用。自2020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的“秩序观”发生明显转向,既有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失效促使阿拉伯国家开始从“道”而非“术”的层面进行反思,而答案正日益清晰并形成共识:一是阿拉伯国家要尽快实现战略自主,摆脱长期以来对西方过度的结构性依赖关系;二是要尽快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恢复和平、实现和解,并建立有效的地区性危机解决机制;三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回到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为基础的轨道,为未来发展创造公正合理的外部环境。基于这种认知上的变化,阿拉伯国家平衡外交持续发力,海湾国家间的和解、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巴勒斯坦各主流派别的和解都是理念调整后的行为转向。

关于道路问题,其底层逻辑与秩序问题是一致的。阿拉伯世界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一度陷于西方外部压力与自身认知错位的困局之中^③。一方面,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全力在中东地区推行全球化、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五化”进程,急欲将中东纳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小布什还提出

① [约旦]萨米尔·艾哈迈德、刘欣路:《东方的复兴:一带一路与中阿关系的未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

② 薛庆国:《一位阿拉伯诗人为何屡屡准确预测阿拉伯的现实》,搜狐网,2018年1月11日, https://www.sohu.com/a/215983368_120776, 上网时间:2024年7月20日。

③ [约旦]萨米尔·艾哈迈德:《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刘欣路、吴晓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2页。

对“大中东”地区进行“民主化改造”,强制性推销美国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①;另一方面,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很多阿拉伯国家逐渐放弃了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转而模仿美国式、西方式的现代化,未能很好地利用后发优势和资源禀赋,盲目打开国门拥抱新自由主义,最终陷入地租经济和对外依附的发展困境。面对石油时代落幕前摆脱落后局面的最后机会,阿拉伯世界首先要戒除既有观念中严重的“依附”心理,实现从对西方过度的制度性依附到合理的相互依存、从盲目的模仿到批判性借鉴的转化,进而建构符合自身历史传承、文化底色、比较优势的独立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尽管既有的范式和惯性很难迅速转换,但近年来阿拉伯各国提出的各类发展愿景都显露出政策制定者对调整发展路径的迫切愿望和积极态度。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要素耦合会大力促进文明间的交流互鉴,阿拉伯世界在思想层面出现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阿战略合作中的战略属性愈发凸显。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西方企图在中东打造依附关系和对抗性秩序,进而维护自身霸权完全不同,无论是三大全球倡议,还是中东安全架构、八大共同行动、五大合作领域,中方都有效地回应了阿拉伯世界对秩序和道路两大问题的核心关切,并且正在以实际行动、卓越贡献把中阿关系建设成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标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探索全球治理正确路径的表率。沙特与伊朗的历史性和解、巴勒斯坦各主流派别的历史性和解是中阿价值观念同频共振相向而行的标志性成就。因此,如果说以往阿拉伯人“向东看”主要是“着眼未来”的一种策略,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那么当前的阿拉伯世界则是从文明形态的高度,着眼于中阿两大文明携手实现民族复兴与中国全面对接。

(二) 从形象展示到价值建构: 中国对阿拉伯世界国际传播的范式转移

当前的阿拉伯世界正处于思想震荡、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中阿双方观念中的共同性、共通性因素明显增加,从而激发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向东看、向东行。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传播应充分抓住这一重要契机,推动阿拉伯世界对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方针政策从客观性认识到本质性理解再到自觉性认同的提升,进而强化双方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同一事实面前选择相同或相近的行为和策略,并较少受到利益因素的影响。

国际传播的目标和方式与国际秩序、国际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冷战时

^① 唐志超:《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之转换——中东剧变以来的地区政治发展》,载《西亚非洲》2020 年第 5 期,第 43 页。

期,美苏两大阵营激烈对抗,国际传播表现为强政治性,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一般多为政府硬性的政治立场和外交政策表达,充斥着假信息或带有偏见的信息;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传播表现为弱政治性,政治色彩有所淡化,政治目的和立场往往以‘隐曲’的方式,抑或说‘文化传播’的样式予以表达。”^①近年来,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加剧,国际安全局势恶化,局部热战烈度和“新冷战”风险加大,国际传播也再度向强政治性回归,而且因受新一代通信技术和社交网络赋能,信息战、舆论战、心理战、意识形态争夺比以往更具有辐射性、隐蔽性、伪装性和煽动力。

西方国家长期针对不同国家开展舆论战,并一直将价值观的传播和争夺作为国际传播的核心要素,例如美国把“推广美式价值观、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争夺国际话语权”确定为国际传播的三大战略目标,并基于此展开了多层次、多路径的高强度“战略传播”,以图影响外国受众的价值取向,服务美国霸权利益。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际传播总体而言采用的是文化传播范式,尽量弱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以“文”化人的作用,努力以软性的文化呈现和信息交流影响国际受众,展示中国良好的形象,营造积极的外部舆论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希望广义的国际传播,或者说文化样式的国际传播能够完成政治样式的国际传播的目标和任务。而实际上二者虽在大众性等某些方面具有共性,但又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和明显的界限,政治样式的国际传播更直接地服从并服务于外交政策、国家利益,具有更强的目的性、应急性特征。这就导致中国的国际传播,特别是在国际传播能力相对较弱的阶段,其主要范式是展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项成就和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化要素,停留在表层的国家形象上,而在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共同价值的深度挖掘、全面阐释、广泛传播上则存在不足甚至缺位。

时与势的变化要求中国的国际传播应当进行范式调整。对阿拉伯世界国际传播面对的现实是:一方面,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自身的话语霸权加紧开展舆论战、认知战,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议程设置、舆论攻击、话语压制,企图遏制中阿关系发展,制造中阿间的利益冲突和文明对立,诱导阿拉伯国家选边站队,近几年来美国持续炒作所谓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新殖民主义问题等就是典型例证;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面临严重的安全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又处于乱与治的十字路口,急切希望与志同道合

^① 李智:《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并愿意帮助阿拉伯世界摆脱困境的国家发展好关系,愿与中国从文明高度进行全面对接,近期中东阿拉伯世界两大历史性和解都由中国促成充分说明了这一倾向。因此,中国的国际传播要有更突出的问题意识,在文化功能外,更好地承担起政治和外交功能,既要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高度对西方的舆论战进行有效反击,也应从推动中阿关系行稳致远的角度在主动构建中阿共同价值上有所作为。

近年来,中国不断充实和完善着自身的软实力建设,所具备的软实力资源和优势也发生显著变化。软实力有三个主要来源,即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现这种价值观时)、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如果说以往我们更强调文化软实力的作用,那么随着中国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双重质的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比较优势也更加丰富多元,结合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中阿关系,运用好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中蕴藏的软实力资源,可以更好地对接供给与需求,提高阿国际传播效能,助力中阿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

(三) 从话语生成到话语转换: 中国对阿拉伯世界国际传播的策略优化

价值建构是国际传播中最底层也是最困难的部分,需要传播体系各主体、各环节从传播规律出发进行有效配合和持续创新。当前,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国际传播已经解决了两个基础性问题,即传播渠道和话语生成。从传播渠道上来看,尽管从传播力上来说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拥有涵盖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并实现媒体融合发展的完整的国际传播矩阵,在传播主体上也形成了官方传播主体、学术传播主体、大众传播主体相互补充的基本格局,具备“发出声音”的技术支持和渠道保障。从话语生成上看,无论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国家全面合作规划纲要》《深化面向和平与发展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文件》和“中东安全新架构”“八大共同行动”“五大合作领域”,这些倡议和政策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破解阿拉伯世界发展难题、应对中东安全挑战、促进中阿文明互学互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为向阿拉伯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并阐释好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提供了丰厚且成熟的话语资源。

传播渠道和话语资源是开展价值建构的基础,但不能直接转化为话语优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传播必然受到历史、文化、政治、外交政策、意识形态

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造成传播过程中“文化折扣”的出现^①。因此,尽管话语资源已经生成,但如何对话语资源进行有效的转换,即做好“编码”,会直接影响受众的“解码”效果和接受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国际化语言和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融通中外、贯通古今,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本质上就是要做好话语转化,创新“编码”方式,形成既反映中国人思维方式特点、又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的话语,否则就会造成“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局面。值得强调的是,所谓编码,核心是谁来编和如何编的问题。国际传播的主体可大致分为官方传播主体、学术传播主体、大众传播主体三类。官方传播主体包括政治人物、政府机构等,鉴于其自身的政治属性,其话语天然具有权威、准确、深刻、简洁、严肃等特点,因此官方传播主体主要的职责是话语生成,而非话语转化。话语转化更多地应当由学术传播主体和大众传播主体来承担和实现。

学术传播主体在阐释中阿共同价值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拥有庞大而复杂的文化体系,被认为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相比低语境文化,与高语境文化交流中需要更多的“语境”来支撑,如果没有足够的背景信息,往往会使异质文化的信息接收者产生困惑或误解。阿拉伯世界虽然有着“向东看”的强烈愿望,但因其历史上长期“向西看”,实际上对中国的话语体系,特别是政治话语体系及其语境是不熟悉的。对此,学术传播主体作为连接官方传播主体和大众传播主体的中间环节至关重要。一方面,学术传播主体依托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可以从多学科视角对抽象的、蕴含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政治话语进行转化,通过学理解析、逻辑阐释把“道理”讲清楚讲明白,为大众传播进一步讲好故事提供丰富语境支撑和编码资源;另一方面,学术传播主体可以通过开展跨国联合研究和学术出版、组织国际学术对话、接受各国媒体采访等灵活、多样的学术和传媒活动,有效发挥二轨外交的功能,对对象国的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都能发挥辐射作用。目前,中国学术传播主体在对阿拉伯世界价值构建上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挖掘,话语阐释、转化、传播的规模、范围和影响都亟待提高。

大众传播主体是以柔性方式塑造中阿共同价值的重要力量。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通行做法和最佳方式。例如,为改善因反恐战争、强推美式民主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造成的强烈反美情绪,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曾发起了所谓的“共同价值观运动”,萨瓦电台、自由电视台、《嗨》杂志等媒体以来自美国社会各界的美籍穆斯林的亲身经历为素材,介绍美国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移民问题、

^① 李彪:《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折扣”与应对》,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4期,第24-25页。

家庭生活、教育状况、宗教活动、就业情况、社会地位等,目的在于说明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强调美国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和平、宽容、多元、亲情方面的共同性。实际上,在美国外交政策没有质性调整的情况下,阿拉伯人的反美情绪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但美国以柔性方式宣传美国文化、营造美阿拥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做法确实让一部分阿拉伯人乐于将美国的外交政策与美国文化、美国社会区分开来。就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共同价值建构来说,大众传播主体也必须在讲好故事上有所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做了精辟的论述,“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①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较为广泛地存在直接讲道理多、柔性讲故事少,单向的形象展示多、双向的价值互构少等问题。结合当前阿拉伯世界最关心的秩序和道路两大议题,对阿国际传播应从受众需求出发,通过纪录片、影视剧、短视频等各类柔性文化产品,以关联性场景调动阿拉伯受众对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的情绪感受,让阿拉伯受众在“我们”的叙事框架下更清晰地看到“我们”共同的未来,从而更自然地理解中国、信任中国、支持中国。

文化语言学视角下 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传统价值之相通性

肖 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教授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也是人类学习、思考、交际的工具,语言更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人类思想的内容,发挥着信息传递的功能,也影响着人的思维与价值判断。语言像一面镜子,折射着语言背后的民族历史文化、经验智慧。谚语是一个民族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语言的一种重要现象。谚语产生于民众生活,由各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创作,广泛流传于民间,蕴涵着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表达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经验,集中体现着各族人民的心理特点、

^① 《习近平论新闻舆论工作》,中国文明网,2025 年 1 月 14 日,<http://www.wenming.cn/sxll/20250114/72800d6b902c473db9d4afd26c99e400/c.html>,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16 日。

精神气质和思想倾向、价值观念,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积累的粹。谚语通常言简意赅,表达通俗,但深富教育意义,鲜明地传递着、长远地影响着语言背后文明的价值观取向。

中国传统价值观渊源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是中华民族历经世代逐渐形成的集体价值取向,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蕴含着中华民族集体的智慧。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同属东方文明,同样有着悠久丰厚的历史积淀、多元的文化结构,发展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做出伟大的贡献,两大文明在传统价值上具有许多相通性与相似性,透过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语言现象可以得到充分印证。

“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关系的学科,其任务是对凝结在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描写、分析和阐释”^①。汉语与阿拉伯语中都有海量的谚语,在文化语言学的视角下,通过梳理分析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谚语,我们可以透视两种语言背后的文明所倡导的价值取向,从而清晰地看到两大文明传统价值取向上的许多相通性。“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记录符号,它从多个角度反映着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风貌。”^②汉语、阿拉伯语中表达、印证两大文明传统价值相通性的谚语有很多,我们可用以下四个维度来对其进行梳理,分别是处世维度的贵和尚中、为人维度的重情好义、立身维度的至诚守信、行事维度的勤奋务实。

(一) 处世——贵和尚中

中阿两个民族在处世的维度上都倡导“贵和尚中”价值倾向。《中庸》第一章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③《中庸》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被列为“四书”之一。通过书中的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社会在价值上对“贵和尚中”价值的倡导。“整个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观之体系,唯仁义与中正是其最根本精神和最核心价值观念,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④贵和尚中的价值导向,伴随着以农耕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形成、发展并世代相传。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它要求人们为人立身要中正,处事要

① 国少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文化语言学视角》,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② 朱立才:《汉语阿拉伯语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5 页。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19—321 页。

④ 王泽应:《核心价值与民族魂魄——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第 9—16 页。

坚守正道,力避过分或不及的偏激行动,使人际关系保持一种团结、和谐状态,以利社会的发展。“中和”作为道德范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内容,它既是人伦之道,又是君子之德;它要求人们的喜怒哀乐之情思和欲望应保持适当的限度,行为要合乎礼仪,中正不偏,和而不同,防止行为偏激,背离中正。一个理想的世界,理想的社会,应是各行各业、具备各种才能的人,和而不同,恰如其分,各得其所。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基于游牧生产方式,虽与中国文明基于农耕作业的生产方式不同,但在处世维度上都重视集体、群体的价值,倡导贵和尚中,与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取向高度相通。“阿拉伯民族也具有‘贵和’的美德,伊斯兰教更是劝人们行善积德,与人为善。阿拉伯人提倡入乡随俗,以协调关系,避免冲突……认为和气致祥,凡事居中为佳。”^①古代阿拉伯人以逐水草而居的方式,过着游牧的生活,在游牧的贝都因社会里,“社会组织单位是集体,而不是个人。个人只有作为一个集体的成员时才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②,对于集体利益、群体荣誉的高度重视,使得阿拉伯文明自古形成了乐群贵和的价值导向。在贵和的价值导向下,中世纪阿拉伯人以高度的宽容精神汲取其他各族文明的精华,在阿拔斯帝国时期,兴起闻名世界的“翻译运动”,为世界文明保存了大量珍贵的遗产。

贵和尚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倡导的重要价值。中阿传统价值观念都号召人们在处世中以贵和尚中为原则,都强调以中为度,不偏不倚,过犹不及,追求团结一心,协调人际关系,避免与人冲突,构建和谐和睦。“作为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贵和谐,尚中道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③反映“贵和尚中”思想的汉语谚语有很多,例如:

家和万事兴。

和气致祥,乖气致戾。

和气生财。

和气不蚀本。

先礼后兵。

天不颇覆,地不偏载。

① 周烈、蒋传瑛:《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8 页。

② [美]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马肇椿、马贤译,北京:华文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 页。

③ 刘忠孝:《从和谐社会的视阈看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载《学习与探索》2007 年第 4 期,第 55-58 页。

天道忌全,人情忌满。

世间万策,惟推中庸。

反映这一价值导向的阿拉伯语谚语也有很多,例如:

你的和颜悦色是朋友们的珍品。

和气的回答可消怒。

凡事居中为最佳。

最好的人是那些居中者。

争斗生仇怨,和睦结友谊。^①

先协商,后开战。

“贵和尚中”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历史实践中形成并传承的文化信息。两种文明在传统价值上都具有群体本位的导向,群体优先于个体,尤重“和”之贵与“中”之美。汉语和阿拉伯语语言中的相关谚语承载了这一信息,并世代相传,生生不息地影响着文明的发展,也为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 为人——重情好义

“义”与“利”是一对哲学范畴,在社会价值观体系中,二者之间的权重分配占有重要的影响,是在为人维度上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价值选择。在中国文明传统价值体系中,重义轻利是儒家倡导的重要价值,重情好义的人品是中国文学中常见的英雄或主角的人格特征。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自固有文化时期,就以“豪侠”精神为典范人格的核心要素,“豪侠”精神是阿拉伯古代游牧部落衡量每个人的道德的最高标准。“豪侠”一词在阿拉伯语原文中为“姆鲁埃”,为阿拉伯语“姆鲁埃”一词的意译,“其本意确切第说就是勇敢、好义、慷慨”等意思,所谓“勇敢”主要指针对氏族外部环境而言,指“在为宗族争锋对垒之时,敢于冲锋陷阵,不惜牺牲性命以赴之”,而慷慨好义,则是针对氏族内部环境而言,指对待自己人“宰牲待客,济困扶危,不惜倾家荡产”。^② 对待朋友应以义为先,轻利而重情、慷慨且好义,是中阿文明传统价值的共同导向。

可见,交友重情、慷慨好义是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共通的价值取向。无论中阿文明,都倡导朋友之间应轻利重义,福祸共担,慷慨仗义。《论语·颜渊》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意喻全天下的人都可如兄弟一样相亲相爱。中国

^① 周烈、蒋传瑛:《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第119页。

^② 纳忠、朱凯、史希同:《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3页。

古代文学中有许多诗歌体现了古人对朋友之谊的歌颂,如李白的《赠汪伦》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等都是为朋友而作,生动体现了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对朋友之间应重情好义的价值倡导。体现这一价值导向的谚语在汉语中也有很多,例如:

至亲不如好友。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
交友交心,浇树浇根。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仁义值千金。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同样,阿拉伯人在古代的游牧生活中形成了以慷慨为美德、重情好义的价值导向。沙漠生活环境恶劣,虽拥有的资源与财富十分有限,但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的慷慨却是举世罕见的,贝都因人崇尚重视友情、好义大方的为人风度。伊斯兰教兴起后,倡导天下穆斯林皆兄弟,更加固化深化了为人应重情好义的这一价值导向。阿拉伯语关于为人应重视友情、好义轻利这一价值导向的谚语也有很多,如:

择路先择友。
友情胜于亲情。
友谊是一种甜蜜的责任。
失去朋友如身处他乡。
患难知真交。
仗义是最大的美德。
保护朋友吧,哪怕他在火中。^①

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在各自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为人应重情好义的价值导向,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均十分重视人在社会中与他人的情谊联结,重视友谊、情义的价值。直至今日,“备食济贫、燃炬待客”仍是阿拉伯人十分推崇的为人品格,“仗义执言、有情有义”也是中国人当代生活中高度赞扬的为人原则。汉语与阿拉伯语的谚语反映、承载了两大文明的倡导的重情好义的传统价值,而这些传统价值作为文明的财富也通过谚语这一语言形式得以不断

① 周烈、蒋传瑛:《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第 115 页。

传习、继承、发展。

（三）立身——至诚守信

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强调做人应以至诚守信立身。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诚”是做人内在修养的最重要品质,“信”则是做人外化于行的最根本准则。《论语·为政》说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中,至诚守信是一个人立身之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不仅讲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念,更讲诚信,讲至诚不息的信仰和信念,讲刚健、中正、和谐的伦理品质和价值追求。”^①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也倡导这一价值。忠恕守信在古代就是阿拉伯固有文化所倡导的典范人格“豪侠精神”的重要内涵。据传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自少年时起就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上因诚实守信赢得了“艾敏”(阿拉伯语词语“诚实守信的人”音译)的称号,受到人们的尊崇和敬仰。

作为民族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组成部分,至诚守信是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倡导的传统道德价值,且这一价值自古至今,一直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历来都重视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坚持以“诚实守信”为立身之本,将其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汉语中有许多谚语传递这一价值,倡导人们应在社会生活中以至诚守信作为立身之本,例如:

处世为人,信义为本。
言而无信非君子。
许人一物,千金不移。
人之立世,忠心为本。
不讲信用,难得安宁。
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兴。
好汉一言,驷马难追。
祸莫大于失信。

同样,表达这一价值追求的阿拉伯语谚语也有很多,例如:

大丈夫最大的过错便是失信。
诚实自会闪光发亮,尽管有千万只眼睛看不见它。
无信为大忌。
许诺不兑现,等于无故树敌。
君子的诺言比债务人的债更有约束力。

^① 王泽应:《核心价值与民族魂魄——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9-16页。

虚伪是病,诚实是药。^①

无论在中国还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诚信都是一个人立身的基本原则,也是至高的道德境界。“诚”更强调反省内求的自觉,“至诚”的价值,如曾国藩所说,“惟立诚,故有物”,“诚”是一个人立身成事之本。“信”更体现在外化于行的表现,“祸莫大于失信”、“无信为大忌”这样的汉语、阿拉伯语谚语,承载着“守信”的价值导向,历经岁月,深入人心,为中阿人民代代相传,跨越世代,鲜活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四) 行事——勤奋务实

中国文明自古形成了行事上倡导勤奋务实的价值导向。中国文明渊源流传,体系宏大,儒、释、道的价值兼容并蓄其中,但总体而言,中国文明具有务实的基本价值导向,主张“一勤天下无难事”。“实事求是”更是融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是中国人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勤奋坚忍与务实求真相联,在中国人在行事维度上重要的价值标准。

阿拉伯古代贝都因人以逐水草而居的方式图生存,在沙漠中日夜迁徙,跋涉千里。一旦在迁徙的过程中,发现了水源和草地,他们必须充分地利用每一次的机会,将每一洼水源、每一片草地的资源尽用。在沙漠中的生活,资源有限,环境严酷,使阿拉伯人每天都在面对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为了应酷热难忍又变化无常的沙漠天气,阿拉伯人在生活中自然形成了务实的价值导向。而这种沙漠生活中培养出来的务实精神,随着阿拉伯民族的发展不断得到深化与巩固。

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谚语中,有许多例子都证明了两大文明对勤奋务实价值的倡导,如汉语谚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倡导勤奋务实价值的例子:

人间万事凭双手。
劝尔勤耕田,盈尔仓中粟。
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
勤有功,嬉无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金子无种子,长在勤俭家。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
多虚不如少实。

^① 周烈、蒋传瑛:《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第 106-107 页。

光说不算,做出再看。

同样,在阿拉伯语中,也有许多谚语表达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勤奋务实价值的倡导,例如:

智者凭实干,愚者凭空想。

每一位勤奋者,都会有一份收获。

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擅长的工作。

只要追求,就能获得。

有什么福利不能靠辛劳去实现呢?

早起多福。

不要把今天的工作拖到明天。

成功是工作、勤奋和持之以恒的产物。

谁付出辛苦,必会有满意的结果。

今日一只蛋胜过明天一只鸡。

手中一只鸟胜过书上十只鸟。^①

汉语和阿拉伯语谚语中,倡导行事应勤奋务实的例子有很多,以上梳理只是挂一漏万。这些谚语以简洁明晰的表达方式,折射了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关于行事维度勤奋务实的价值导向。谚语折射了中阿文明在这一点上高度相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体现了中阿文明均重视对勤奋务实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

谚语是一面反映各族人民价值取向的镜子,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化、价值观的高度浓缩。这种表征普通民众思维方式的取向,随着世代更迭与时代发展,日益沉淀积累,“积淀在人们心中,成为处事之道、为人之规,成为一种‘集体意识’。”^②这种“集体意识”的力量深刻而持久,将持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处世、为人、立身、行事上的价值与行为,它既是传统,也是当下。正如阿拉伯当代著名思想家哈桑·哈乃斐所说,“传统就是我们主流文化内部过去带给我们的全部,因此,传统在岁月的过程中,既是传承过去,也是现在的状况。”^③文中梳理的例子虽为管窥,我们仍可以看到,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谚语中都有不少例子反映了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传统价值上相通性。谚语作为语言的活化石,是

① 周烈、蒋传瑛:《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第110-111页。

② 聂锦芳:《确立外国哲学研究的科学导向》,载《人民日报》2016年3月21日,第16版。

③ [埃及]哈桑·哈乃斐:《传统与更新》(阿拉伯文),开罗:安格鲁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各民族智慧和经验的集结。语言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核心表征。“反映在各种语言里的感知模式,与衣服款式、艺术风格一样丰富多样。每一种母语以完全独特的方式教它的使用者如何看待世界,感知世界,在世上行事。”^①

中国和阿拉伯民族虽使用的语言不同,但透过语言现象的表层,我们以文化语言学为指导,深入对汉语和阿拉伯语谚语内涵价值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处世贵和尚中、为人重情好义、立身至诚守信、行事勤奋务实等方面具有相通的价值观。两大文明同为东方文明,文化源远流长,拥有诸多相似、相通的价值理念,这为双方的“民心相通”提供了价值观基础。在此基础上,中阿文明的交流互鉴可从历史文化的深层共情中增进情感共鸣,以贵和尚中的处世原则回应人类社会共同的重大关切,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代交往的创新对话中深化价值共识,以重情好义的为人导向,增强中阿双方交流实效、不断增进双方互信;在经济贸易的广泛合作中加大文化赋能,以至诚守信的立身之范夯实合作根基、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深化民间交往,共同研究深化合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以勤奋务实的行事风格提升合作效能,促进中阿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是文明的精神内核;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既承载着历史积淀的价值,也同时处在持续发展的历程中;既具有历史性、传承性,同时也有鲜活的现实性。纵观中阿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友好交往历史,中阿两种文明之间始终是交流大于冲突,合作大于分歧,而这友好交往的历史基础正是基于双方文明在价值上的相通性。开放带来进步,交流促进发展,中阿两种古老文明在新时代的交流互鉴将为双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同时,两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也将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未来机遇。中阿文明价值的相通性可为双方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提供切入点,为两个文明的发展、变革与更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基础。随着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话日渐深化,人文交流日益广泛,两大文明对彼此价值、文化的相互理解日益加深,有力推动双方同心聚力、携手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共创中阿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①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1 页。

如何在文明互鉴视野下进行 全球南方跨文化叙事构建

黄蕙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人文交流研究员，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客座研究员

全球南方逐渐成为一种构建多极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并开始具有作为话语主体的需要,呈现出历史和文化多元性、复杂性的全球南方。如何构建一种整体和共同叙事成为时代之需。在文明互鉴视野下进行全球南方跨文化叙事构建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中阿同属于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阿文明互鉴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着力点之一。研究全球南方跨文化叙事对如何在更高维度上进行中阿文明互鉴与交流的话语和叙事构建有重要意义。

(一) 美西方话语霸权的衰落与“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崩塌

随着美欧内部治理的失效、社会分裂愈加严重,全球治理在多个领域面临“赤字”,“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面临崩塌,其话语霸权深度撼动。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美欧内部治理的失效、社会分裂等现象愈加严重。“民主灯塔”和“历史终结论”已难以自证其说。特别是在特朗普 2.0 时代,美国与欧洲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使得西方从其文明溯源到近现代制度优越性的叙事不再能够合理解释当下,面临着“话语困境”与“话语矛盾”。

二是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框架和全球治理秩序崩解。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与“退群”行为,联合国体系效能不断下降,多边机制削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歧加剧等使得全球治理“赤字”更加突出。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深刻变化和治理“失灵”使得全球性叙事出现“真空”。

三是美国经济与金融霸权式微。美元信用因金融危机和无限量化宽松严重受损,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 2000 年的 72% 降至 2023 年的约 59%,创 20 年新低。同时美国经济内生风险加剧,国债规模逼近债务违约边缘,所谓“再工业化”效果有限。“美元神话”和“超级经济强国”的叙事受到冲击。

四是美西方多个领域技术垄断被打破。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在数字通信、半导体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领域不断突破西方“技术神话”。中国在 5G、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突破,2024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7.1 万亿美元,占全球

比重 38%。

五是美国在安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传统叙事失去道德制高点。美国在 2021 年仓促撤离喀布尔引发盟友对美安全承若的质疑,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和在清洁技术领域的滞后发展越弱其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

（二）中国实践、全球南方新兴力量呼唤叙事重构

在全球面临严重话语供给不足甚至“真空”的情境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道路和全球南方等新兴力量的兴起,呼唤着一种全球性叙事的重构。中阿文明互鉴也应在此背景下寻求更加面向未来的新的叙事维度。

一是文明互鉴的思想与理念能够成为全球性叙事重构的新范式。文明互鉴能够提供一种带有东方智慧的“元叙事”范式。文明互鉴倡导文明多样性共同发展,相互借鉴、相互融通。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样貌,其在哲学层面超越“二元论”的局限,为全球文明未来发展提供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元叙事”范式。^① 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需要新的智慧与方案,在全球性叙事出现“真空”和话语供给严重不足的当下,基于文明互鉴哲学观的叙事范式,将能够碰撞和产生出新的智慧,解决当前的危机与困惑,推动人类文明进程。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突破了西方式现代化语境。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使受困于西方现代化语境的民族、国家能够有自觉走出“被叙事”困境的勇气与信心。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维度有别于西方,是基于自身的历史与国情走出的现代化道路,具备整体叙事的能力。这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的语境困境,使得现代化有多元叙事的可能性,帮助世界各国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建立属于不同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叙事。

三是中国的民族和文化复兴道路为全球南方国家本土文化叙事提供借鉴。中国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系统性的文化工程逐步构建现代性叙事,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了更广大的精神空间和更丰富的精神内涵。传统文化的基因在现代性叙事中不断提供新的智慧,开拓了现代语境的维度与空间,使得叙事具备生命力与创造力。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本土文化叙事构建的借鉴。

四是全球南方呼唤跨文化多元协同共同叙事。随着全球南方的发展和对全球南方本质与概念研究的不断深入,全球南方将成为一个叙事的“主体”,需要具备整体叙事和话语生成的能力。全球南方国家呈现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发展需求的共同性,这需要全球南方国家具有跨文化协同叙事的能力,包括跨文化对话平

① 卢静:《全球文明倡议:理念与行动》,载《人民论坛》2023 年第 11 期,第 85-89 页。

台与机制的建设,共同议程议题的设置与推动等等。

五是技术赋能与“平台世界主义”提供跨文化叙事可能。TikTok、网飞(Netflix)、推特等通过多语种翻译、算法推荐内容、虚拟社群等技术手段打破地理与文化隔阂,使跨文化叙事成为可能,通过平台化实践在“第三空间”为文化杂糅和价值共享构建场域,^①例如2023年TikTok用户日均跨文化内容消费时间达23分钟,远超传统媒体,这为构建跨文化共同叙事提供了可能。

(三) 聚焦全球挑战、共同发展与治理困境等议题

全球南方跨文化叙事构建需要聚焦和发起南方国家共同关注的议题,以议题推动话语的形成和共同叙事的构建。中阿文明互鉴也应以议题为动力,聚焦以下议题推动共同叙事:

一是现有多边机制失能与真正的多边主义。现有多边机制失能与区域化割裂、“小多边”集团、“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等盛行严重冲击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对什么是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未来将去向何方存在疑问,中国正本清源,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确保世界多极化稳定发展。^②

二是全球治理困境、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机制创新。当今世界面临治理结构失衡与权力博弈加剧,治理机制碎片化与效能衰退,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挑战复杂化等全球治理困境。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三大倡议和超过10种的“共同体”概念,包括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亚洲、海洋、中国—东盟共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为全球治理提出体系性的理念和方案。

三是不同道路的现代化与中国之“治”。中国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其治理理念值得寻求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南方国家借鉴。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关于“国家”的观念与“治”的思想在中国发源很早,应当深刻发掘中国之“治”在思想层面的内涵与价值,以及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为南方国家提供借鉴。

四是传统文化继承创新与多元性的现代性叙事构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从充分的文化自信开始,继而对

① 史安斌:《迈向平台世界主义:数智时代的国际传播前瞻》,载《对外传播》2024年第1期,第12-16页。

② 张玉环、王文起:《“真正的多边主义”:理论意义与中国实践》,载《国际观察》2025年第1期,第22-26页。

传统文化和本民族文化进行系统性整理、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不同民族和国家重塑自身现代性的正确和有效路径,中国成功的现代性构建可以为全球南方提供借鉴。

五是本地化知识生产、全球共享与跨文化传播。话语生成与叙事构建需要基于本地化的知识生产,本地化知识生产是进行进一步的知识加工和理论创新的源泉。在技术赋能之下,知识生产方式发生很大变化,甚至带来生产范式和传播范式的重构,这给处于话语弱势地位的南方国家带来本地化知识生产、全球共享和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与机遇。

六是新兴治理领域如全球数字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全球新兴治理领域不断兴起,如全球数字治理、人工智能伦理、平台与共享经济治理、元宇宙与虚拟空间治理等。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平台垄断等议题缺乏统一标准,美西方主导数字霸权,如何在新兴治理领域争取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全球南方重要议题。

(四) 叙事逻辑、框架与现代性建构

全球南方作为话语主体的整体和共同叙事需要找到新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框架并实现其现代性建构,文明互鉴的思想与理念为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路径。这也是中阿文明互鉴话语与叙事创新的源泉。

一是以“文明互鉴、美美与共”、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价值共同体建设为基本叙事逻辑与叙事框架。文明互鉴蕴藏着超越西方二元论的哲学思想,以文明互鉴作为逻辑起点进行“元叙事”,将超越西方以文化、制度、意识形态差异为逻辑起点的叙事,在更高纬度上构建叙事逻辑。同时,以文明互鉴为逻辑起点的叙事也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形成平等包容的叙事框架。叙事逻辑和叙事框架的不同将创造全新叙事空间。

二是加强基于文明互鉴的整体叙事、共同叙事理论和实践研究。当前的叙事学是主要由西方学者构建的一门学问。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文化差异的语境、符号、意义和跨文化研究,对于整体叙事、共同叙事的研究显得非常不足。^①而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全球南方的发展,呼唤整体叙事和共同叙事。全球数据流动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传播现象已表明,整体叙事、共同叙事和全球性叙事已成为趋势。中华文明具有历史悠久的整体和共同叙事的传统、智慧与能力,应当为整体和共同叙事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三是体系性地进行现代性话语创新与构建,超越西方现代语境“困境”。从

^① 唐伟胜:《打造具有中国气象的叙事学研究——简评〈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七卷本)》,载《中国比较文学》2025 年第 2 期,第 273-276 页。

中国和全球南方的鲜活现代化经验中进行知识生产、进行具有原创性的概念、范式创新和系统性的话语构建,超越西方现代语境“困境”。西方现代语境也遭遇着不能自证和自圆其说的“困境”,当下正是一个亟需话语创新的时代。学术先行非常重要,需要进行深度理论阐释,特别是进行哲学层面的辩证与回应,这样的概念、范式和话语创新才能真正引发关注、引起共鸣。越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话语创新,越具有“具象化”和传播性。例如毛泽东创造的“三个世界”的概念和理论,至今仍然是一种话语的遗产和财富。

四是发掘具有全球传播和跨文化价值的元素进行现代性叙事与转译。全球南方国家应发掘具有全球传播和跨文化价值的元素进行现代性叙事与转译,以增强南方国家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例如印度对瑜伽成功的现代性叙事就非常值得借鉴,通过所谓驱魅与科学化改造、产业化与身份重构等使瑜伽改变了宗教标签,成为一种广为西方和全球接受的“身心训练”方式。中国的太极、武术、瓷器、茶、丝绸等虽然已成为标志中华文化的符号,但还不具备这样的叙事能力,也缺乏现代性释义。

五是技术赋能与数字“第三空间”话语权变迁。“第三空间”一般指介于私人领域和工作场所的非正式公共空间。数字“第三空间”孕育着数智时代的叙事变革,开放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算法逻辑在底层的构建等带来“第三空间”话语权的“革命性”变化,^①DeepSeek、抖音、小红书等从信息生产、流动到议题引流等层面推动话语空间变革。有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媒体,跨文化议题共鸣度在社媒提高了40%，“回音室效应”则使议题传播周期延长三倍。同时,数字“第三空间”的议题呈小规模爆发、“草根创新—精英呼应”等复杂变化。这些都对新的叙事构建提供了文化交融和议题引导的场域。^②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赵 军)

① 邱泽奇:《人机互生:范式革命与知识生产重构》,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1期,第36-40页。

② 桂涛:《网络共同体:豆瓣社区“第三空间”的建构与自我披露》,载《新媒体研究》2021年第14期,第23-26页。